

魔幻词语，灵知载体

——“浪漫主义”概念辨析

胡继华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北京 100024)

摘要：“浪漫主义”(Romanticism)常常在多种意义上被使用，在18、19世纪的宏大理论脉络之中，这个术语的历史同现代、理性、世俗化及其相关哲学假设，还有趣味、判断标准、审美文化，存在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这种复杂的关系，甚至汇入了思想史、批评史以及政治观念史的语境之中，成为跨学科考察的对象。在观念史家笔下，这个桀骜不驯而拒绝定位的“浪漫主义”是一个危险的异数，历史灾异的根源。在文学批评的整体视野下，同古典主义相比较，浪漫主义在诗歌、诗歌想象作用与性质上存在着相同的看法，对自然与人的关系所见略同，对诗体风格极其修辞上都有相同的选择取向。在政治思想史的论域，浪漫主义是一种政治决断论，它宣告每一个体都可以行使高贵无羁的自由意志，伸张自我，决定命运，选择未来。

关键词：浪漫主义；观念史；整体批评观；政治哲学

[中图分类号] I1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539(2014)06-0001-08

The Magic Words as the Vehicle of Gnosticism: Discriminations on the concept "Romanticism"

Hu Jihua

(Beij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24, China)

Abstract: Having always been used in many senses, the history of the concept "Romanticism" has a kind of complicated relationship to modernity, rationality, secularization and various philosophical assumptions concerning with them, and to the aesthetic taste, the criteria of judgment, and cultural milieu as well, in the context of grand theories in the turn of 18th and 19th centuries. Then, the history of concepts within the complex connections with history of intellectual, critical, political ideas has become the object of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However, we could discern three strains in the narrative tradition. Firstly, according to the historians, as one of the most intractable and unconstricted concepts, "Romanticism" may, properly speaking, be a dangerous heterogeneity, which is possibly the roots of historical disasters. Secondl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literary criticism and compared with classicism, it seems to us that there have been, among Romantics in diversity, some common opinions about poetry, poetic imagination and its characteristics, the relations of man and universe, with the convergent orientations in poetic modes and its rhetorics. Finally, in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s, it may be asserted that the essence of Romanticism consists of a certain political decisionism, laying claim that every individual has its own right to actualize the noble will to freedom, self-assertion, self-determination of its destiny, and choice of its future.

Key words: Romanticism; history of ideas; holistic criticism; political philosophy

一、引言

“浪漫主义”(Romanticism)常常在多种意义上被使用，其最狭隘的意义，同德国“早

期浪漫派”(Fruhromantik)相联系，特指1796年至1802年间一个作家诗人群体、一份文化杂志及其文学实践、诗学风格与批评主张。这个作家群体被后世称为“耶拿浪漫派”，其领袖人物乃是施莱格尔两兄弟——兄长奥古斯特和

[收稿日期] 2014-05-26

[作者简介] 胡继华(1962~)，博士，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跨文化研究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

弟弟弗里德里希，成员包括奥古斯特的妻子卡罗琳娜（Caroline）、弗里德里希的妻子多萝台娅（Dorothea）、诗人哲学家诺瓦利斯、作家蒂克、神学家施莱尔马赫、哲学家谢林。他们携手支撑的杂志是施莱格尔兄弟所创办的《雅典娜神殿》（*Athenäum*），它以断简残篇的书写方式，汇通诗、史、思，催生浪漫诗风，建构小说文体，缔造文学观念，展开实践批评。本雅明的名篇《德国悲剧的起源》（*Ursprung des deutschen Trauerspiels*）之开篇，就回荡着早期浪漫派的精神，延续着其诗学的问题意识。早期浪漫派行年短暂，但意气风发，颇具文学革命气象，甚至在相当程度上塑造了伟大而苦难的19世纪欧洲的精神品格。

浪漫主义究竟起源于何处？肇始于何时？从18世纪末至今，学界可谓聚讼纷争，无以定论。德国早期浪漫派的精神领袖施莱格尔兄弟，以及将德国浪漫精神举荐给法国的斯太尔夫人，大体上都相信浪漫主义起源于罗曼语国家，据说它粗头乱服，野性难驯，崇尚古朴，弃绝当前，或者干脆就是经过乔装修饰的普罗旺斯游吟诗人的诗歌，将女性提升到神性的高度，而把情欲提升为爱本身。宗教文化史家勒南断定浪漫主义起源于凯尔特语国家，而帕里斯认为法国的布列塔尼地区是它的原乡。塞埃（Seillière）将浪漫主义直接追溯到柏拉图、新柏拉图主义和托名的狄奥尼修斯神秘主义学说的融混，纳德勒（Joseph Nadler）说它是客居易北河和尼蒙地区德意志人的乡愁，思念原乡、追怀古老的中部德国，令这些浪游者和殖民者忧伤成疾、结想成梦。德国浪漫主义诗人艾辛多夫（Eichendorff）说浪漫主义乃是新教徒对荣耀不再的天主教會的怀旧。法国浪漫主义作家夏多布里昂（Chateaubriand）则说，即便经历过流亡与客居，也不一定有浪漫情感，所以浪漫主义是灵魂自我游戏而获得的神秘无言的欢愉。埃纳尔（Joseph Aynard）说，浪漫主义是指向他者而非指向自己的爱，是一种对抗权力意志的意愿。默里（Middleton Murry）说莎士比亚本质上就是浪漫主义者，卢梭以后的伟大作家都不可避免地成为浪漫主义者（伯林，2008：22）。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卢卡奇（Georg Lukács）语出惊人，断定浪漫主义从抽象走向幻灭，表征着内心的失败。面对自身和世界，浪漫

主义者变得令人怀疑，令人失望和残酷，只留下奢侈享乐和辛酸苦难、悲恸与冷嘲，以及一堆美丽模糊的混合物（卢卡奇，2012：110）。

从语源角度看，“浪漫”与罗曼语的历史命运休戚相关。罗曼语乃是大众化的通俗语言，相对于教士阶层的拉丁语。用低俗罗曼语写成的文学作品、文学形式、文学体裁，便被称为“romant”、“romanze”，以及“romancero”。17世纪，“romantique”、“romantick”和“romantisch”首先出现在英国，然后出现在德国，常常带有贬义，甚至有道德上谴责之意，指那种莫焉下流、不由正道而必须被摒弃的东西。也就是说，此类文学应当被抛弃在现代之前的黑暗之中。因为，它是那些不可思议的奇迹，难以置信的骑士传说，狂放无羁的情感，过分伸张的魔性。施莱格尔称《堂吉珂德》乃是浪漫风格的原型，随后几乎成了陈词滥调。夏多布里昂则称浪漫主义是一种神秘激情的哲学，17世纪和18世纪的瑞士批评家称浪漫主义为一种文学批评形式，多少蕴涵着那么一点点肯定的涵义。但是，如果将“浪漫”一词放回到17、18世纪宏大的理论脉络之中，我们就不难看到，这个术语、这个文学体裁、这种诗学风格、这种批评形式的历史同现代、理性、世俗化及其相关哲学假设，还有趣味、判断标准、审美文化，存在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Lacou-Labarthe & Narcy，1988：3~4）。这种复杂的关系，甚至汇入了思想史、批评史以及政治观念史的语境之中，成为跨学科考察的对象。

二、矛盾与歧异的“观念结”——思想史家的“浪漫主义”

1923年，美国“观念史”学者阿瑟·洛夫乔伊（Arthur Lovejoy）向美国现代语言学会提交了一篇讲稿，题目为《诸种浪漫主义的辨析》，这份讲稿于1924年发表在该学会的会刊PMLA上。他运用“观念史”方法，将“思想”区隔为“观念单元”，对近3个世纪以来与“浪漫主义”相关的概念进行了梳理与辨析。他夫子自道，要根据文献所载权威人士的意见来定义浪漫主义，那是忍受痛苦，而终归绝望。浪漫主义这

个术语包括多种涵义,这些涵义明显互相矛盾。随着文献的积累,矛盾与歧异有增无减;更耐人寻味的是,这个术语本身就具有激发矛盾和滋长歧义的神奇力量。时移俗易,岁月推移,这种神奇的力量却依然如故,甚至变本加厉了。洛夫乔伊总结道:“浪漫”一词渐渐扩容,被用来指称如此之多的事物,自然就成为一个空虚的能指,而不再发挥语言符号的功能(Lovejoy, 1924: 229~253)。羡慕者可以将他们所羡慕的一切称为“浪漫主义”,而怨恨者同样也可以将他们所怨恨的一切称为“浪漫主义”。

据洛夫乔伊考察,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意见,乃是宣称浪漫主义为19世纪的邪恶与不幸、以及当今人类精神痛苦不堪的原因。拉塞尔(Lasserre)、塞埃(Seillière),以及以白璧德(Irving Babbitt)为祭司的美国新人文主义者,则争相出谋划策,致力于消浪漫主义之毒,治人类精神之病。拉塞尔(2010: xli)指出,浪漫主义精神非它,本质上就是法国革命精神。那场革命从旧制度的黑暗心脏获取了除旧布新的魔力,同往古告别,废黜了欧洲古典文明的传统,从而将人类推向了灾难的深渊。消浪漫主义之毒,治人类精神之病,除了恢复古代的秩序与信念,放弃进步观念及其盲目乐观态度,就别无灵丹妙药了。塞埃指出,法国革命精神蕴含着理性的、斯多葛主义的、笛卡尔主义的古典精神,因而是合理的、永恒的,将会推动世界日趋进步(Seillière, 2010: xiii)。但革命运动偏离了其真实的进程,神秘主义和社会动荡因素出现,浪漫主义也就恶名昭著了,成为千夫所指,万人所咒。故而,解铃还须系铃人,只需将革命导回正道,浪漫主义也将洗心革面,而人类精神也就理性健朗了。白璧德将卢梭视为浪漫主义的鼻祖,而浪漫主义乃是博放时代的个人主义与自我主义的过度张狂。在《卢梭与浪漫主义》(1909年)中,白璧德对卢梭做出了如下严厉的判决:

卢梭致力……拒绝一个伦理中心的观念,以及这个中心所涵盖其中的特殊形式。一切人文和宗教建立这个中心的努力,将一个严整有序而赋予中心的原则对立于扩张本能的努力,在卢梭看来都是武断随意而且矫揉造作的。他并没有将两类中心区别对待:一类是希腊悲剧诗人索福克

勒斯借着直观而把握的伦理圭臬或道德中心,另一类是伪古典主义者希望通过机械的摹仿而达到的中心。从这个基本前提出发,他论证唯有变异原则才生机盎然,人的天才与原创同其本来意义上的离经叛道/离心怪异直接成正比。故此,面对一切既成的圭臬,他都随时准备伸张其独特差异。(白璧德, 2003: 54~55)

新知广泛扩散,随后个体与文化独特品格差异分殊,此乃博放的移心(expansive decentering)。白璧德认为,这场博放的移心运动在“古今之争”及其现代的凯旋中可以找到最后的历史因缘。白璧德的言论令人追忆阿诺德,又显然预示着理查兹。在他看来,席卷我们“偏离普遍人文而越浪越远”的危险“离心”与“扩张”的驱动力量,可归因于浪漫主义所弘扬的历史方法,“结果它是如此强有力地溶解了基督教与古典教义”。浪漫主义者在远东发现了奇幻而事实上难以消融的语言文化,“起源的研究”放纵无度,而成为“侵蚀古典传统”及其档案所载的种族中心的话语标准,因而加速了文化的无序败落。面对此等文化紧迫情境,白璧德力挽狂澜,成为中流砥柱,提议在高等教育中向青年灌输“古典”人文主义。因为这种古典人文主义,乃是经回忆而生的种族中心论人文主义,不仅纯化了其后代的“人道主义”积淀,而且更加谨慎地纯化了现代的、“溶化”了远古时代与民族的知识。

洛夫乔伊无奈地说:对于一个指称空虚而内涵驳杂的术语,最好的办法是停止谈论它。可是,温柔或者粗暴地弃之不顾,当然也无济于事。他又绝望地把“浪漫主义”视为一场危机,一场危及人类生成秩序灾难,一种决裂伟大“存在之链”的邪恶势力。治病必先探得病源,故而必须用精神病理学的方法来矫正19世纪思想史上的紊乱与无序,对“观念”的一般进程,对现代思想和趣味中的主要阶段及其过渡的逻辑与心理关系,尝试做更为清晰的理解。洛夫乔伊的观念史考辨先行于福柯,预示着“知识考古学”及其迷惘的结局:在多重线索的纠结之处拷问浪漫主义,在历史的浑浊巨流之中追溯浪漫主义,却发现一个时期的浪漫主义与另一个时期的浪漫主义毫无共同之处,一个国家的浪漫主义与另一

个国家的浪漫主义几乎没有公分母。17世纪40年代,浪漫主义在英国发端。17世纪90年代,浪漫主义在德国登堂入室,且得以正名。1801年和1820年,法国爆发了同英国、德国相关的文学文化政治运动,约定俗成地沿袭了“浪漫主义”这个称谓。然而,白璧德十分情绪化地指出,这些英法德三国在200年间接力一般演绎的“浪漫主义”,在培根、卢梭那里发现了一系列丰富幽深而且自成悖论的观念。诠释这种观念的微言大义,白璧德称之为“科学的自然主义”和“感伤的自然主义”,而且断言它们必须对现代偏离中心的紊乱运动以及古典人文精神的衰败负责。洛夫乔伊断言,“每一种所谓的浪漫主义,都是极其复杂而且常常不稳定的才智的融合”。因而,他的“观念史”及其“观念单元”分析的方法,在处理复杂的“浪漫主义”思潮时表现出了独到的优势。依据这种“观念”史观,历史上任何一种观念都是由各种相互关联的“观念单元”构成的,观念单元之间的关系,通常不是出于铁一般不可破除的必然逻辑,而是出于非逻辑的联想。浪漫主义当然也是如此,自从这个词语被杜撰出来,在其跨文化的散播过程之中,每种观念都部分地源自其先天和后天的含糊歧义,并不断地累积含糊歧义,以至于当下所见的“浪漫主义”被含糊歧义折磨得面目残损,气息缥缈。

洛夫乔伊假设,有A、B、C3种浪漫主义,A具有一种独特的预设或先验机制,和B所具有的另一种独特预设或先验机制有共同之处,我们称这个共同之处为Y。但是,A和C也分享一个独特的预设或先验机制,C却有一个独特的预设或先验机制X。于是,每一种浪漫主义都部分地分享他种浪漫主义的独特预设或先验机制,却永远不能彼此化约,还原为一个共同的预设或先验机制。换言之,每一种浪漫主义都构成一个具有独特预设或先验机制的“观念单元”,而这些观念单元都如影如幻,变异莫测,只能适用于自己时代的思想运动和流派。这就是17世纪英国、18世纪德国、19世纪法国浪漫主义的情形。17世纪英国浪漫主义传承了文艺复兴的自然主义,空腹虚心向泰古,顶礼膜拜大自然。而泰古和自然都是鸿蒙荒野、狂放不羁、声名狼藉的,既是激情的来源,又蕴涵着原始的生命力。18世纪末在德

国获得了生庚证的“浪漫主义”却开启了反自然主义的潮流。人为高于造化,故而必须以级数的方式将“世界诗化”,甚至借着对古代希腊和中世纪黄金时代的追思,而否定落拓不羁的狂放天才。德国浪漫主义独特的预设或先验机制,不是自然主义、尚古主义,而是作为与古代相对立的“独特现代性”(das eigentümlich Moderne),即“追寻无限实在性”的基督教精神。德国浪漫主义的乡愁所系,不在此生此世,而在彼岸他乡。对德国早期浪漫主义者来说,灵魂是漂泊在大地上的异邦人。超感觉的现实,甚至日常生活的眩惑与梦幻,既是基督教尘世之外家园的灵光乍现,又是浪漫主义艺术的真正魅力。无限性的观念消灭了有限性,生命走向了幻影世界,沉入黑夜(A. W. 施莱格尔语)。18世纪法国浪漫主义将自然主义与反自然主义、尚古主义与基督教精神十分矛盾地集于一身。其代表人物夏多布里昂一方面渴望与纯情的印度情人厮守到老,另一方面又厌倦离群索居的孤岛生活。他赞美艺术之中的“自然”,但这个自然不是鸿蒙荒野,而是人文尺度,是古典主义的艺术圭臬。通过这么一番“观念单元”的分析比较,洛夫乔伊指出,在英国和德国的浪漫主义中存在一定的预设或先验机制,但仍然存在重大的对立;在法国和德国浪漫主义之中又存在另外一些共同点,但也存在重大的对立。总之,在它们之间并不存在逻辑上稳固的基点,而在道德境界和文学前提上,它们又绝对对立。所以,没有一个范畴像“浪漫主义”那么不堪、狼狈、尴尬。它并不具有巨大的观念复杂性,且在很大程度上人们被情感所支配。人们用这个术语来指代包罗万象的复杂性,指称文学、思想、文化、政治历史潮流之中那种诡异的非人的原始动力,指称其起源、兴衰、汇流、复活的戏剧性相互作用。

然而,荒野剑气皆肃杀,楼台箫韵尽含悲。洛夫乔伊笔下这个桀骜不驯而拒绝定位的“浪漫主义”,在历史学家眼里却是一个危险的异数,历史灾异的根源。洛夫乔伊先说,浪漫主义的意义就是它没有意义。然后,他又建议,最好思考一下1780年至1800年这个世纪交替的年代,在德国流传的各自独立而又蔚然成风的3个观念之间的特殊关联。在这种观念单元之中,

看看究竟哪种重量级的精神“塑造了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生死相依的心境”，以及它如何愈演愈烈地导致了1940年的悲剧景象。这3个观念单元，乃是18世纪最后20年，在德国蔚然成风的整体（Ganzheit）、动力（Streben）以及独特（Eigentümlichkeit）。（Lovejoy, 1941: 3）而这3个观念单元，几乎原封不动地复制在希特勒主义的强权政治之中。观念史便助桀为虐，书写了20世纪政治的血腥与黑暗，抹去了古典道德，留下了伦理境界中令人不安的天空地白。

三、整体视野下的文学规范——批评史上的浪漫主义

文学批评家韦勒克（Rene Wellek）接受思想史家洛夫乔伊的挑战。他针锋相对地提出，洛夫乔伊的论点是极端的“唯名论”，不仅毫无根据，而且是无理取闹。以整个欧洲传统来观照16世纪后300多年的文学文化运动，韦勒克断定：“各个主要浪漫主义运动形成了一个由理论、哲学和风格组成的统一体，而这些理论、哲学和风格又形成了一套互相包涵的连贯思想。”（Wellek, 1949: 2）与洛夫乔伊截断“存在之链”而寻觅观念单元的办法不同，韦勒克的办法是观澜索源，将各种文学运动和文化思潮视为历史过程中某个特定时期支配当时文学的规范体系，而非任意规定的语言标签或形而上的实在。罗可可、巴洛克、古典主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这些都不是任意的标签，而是一些支配特殊历史时期的规范体系。从规范体系去理解浪漫主义，韦勒克相信，这个术语作为一种对于“新型”诗歌的命名，其涵义不会让人产生误解：浪漫主义即那种与古典主义相对立，并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得到启发，并以此为榜样的诗歌。

在整体性视野下考察浪漫主义具体的文学实践，韦勒克发现：同古典主义相比较，整个欧洲的浪漫主义在诗歌、诗歌想象作用与性质上存在着相同的看法，对自然与人的关系所见略同，对诗体风格及其修辞上都有相同的选择取向。诗学、世界观以及诗体风格3方面的统一性，就构成了浪漫主义美学标准与文学实践的重要方面：“就诗歌来说是想象，就世界观来说是自然，就诗体风

格来说是象征与神话。”（Wellek, 1949: 147）

韦勒克推重的3组概念渊源于前启蒙时代，在18世纪已经作为潜在的力量在酝酿。第一，一种有机的自然观源自柏拉图主义，经过了布鲁诺、波墨、剑桥新柏拉图学派以及夏夫兹博里的断简残篇而流传。第二，那种把想象当做创造力而把诗歌看做是预言的说法，直接脱胎于康德的批判哲学，当具有更为遥远的希伯来文化渊源。在某种意义上，正是想象力将信仰与诗歌、启示与理性融为一体的。所以，对布莱克来说，弥尔顿的影子已经进入了历史的噩梦，整个诗歌的历史就是信仰与诗歌、启示与理性冲突的巨大噩梦的表现（布鲁姆，2013: 150）。所以，华兹华斯进入了与灵魂的孤独对话，断定想象力乃是对苍白的人类语言的补救。第三，神话及其象征主义，在历史上可溯源至世界文明的史前史。苏美尔泥版楔形文字、埃及象形文字（庙堂镌刻文字）、希腊B型字母表，以及通过这些载体传承的神话与象征体系，都是浪漫主义的“遥远近亲”。浪漫主义的美学提出了象征、审美和难以表达之物以及无限可阐释之物的联系，但这种美学源自神秘主义。神秘主义者将自身的经验导向极端，绝地而不能通天，而在他的各种幻想和象征所表达的无形经验中，对一切权威开始怀疑、解构甚至进行虚无主义的破坏。荣格曾指出，作为最为遥远的人之体验，神秘主义经验的内容，就昭示生命即不断地毁灭（埃柯，2006: 274）。所以，韦勒克说，浪漫主义是某种旧事物的复活，但这种复活绝不是旧事物的重复。在一个启蒙后的时代，浪漫主义的神话注定是纠缠着理性的神话，浪漫主义的象征注定是阐释的权力意志所制服的象征。换言之，神话是重构的神话，象征是转译的象征。

与洛夫乔伊“（浪漫主义思想）众相纷呈，逻辑上各自独立，在含义上有时互相对立”的怀疑论相对立，韦勒克断言浪漫主义的自然观、想象观和象征观3者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关联，存在着互相蕴涵的关系。没有有机自然观，我们就不能相信象征和神话的重要性。没有象征和神话，诗人就丧失了他必不可少的借以洞察实在的工具。最后，如果没有对人类这种独特的创造能力的信念，也就绝对不会有有一个鸢飞鱼跃的自然世

界和深邃无垠的象征体系。韦勒克最后指出,这种前后连贯而完整统一的思想,就是伴随浪漫主义而遍布欧洲的思想。这种整体视野下的文学规范体系,携带着一种诡异的非人的精神力量,颠覆了18世纪,结合并融合导致了18世纪后期的巨变,引起了西方意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变革。而这就是历史学家和政治思想史学者所关注的话题了。

四、生存样法与政治决断——政治思想史的浪漫主义

1931年,意大利历史哲学家克罗齐(Benedetto Croce)撰写《十九世纪欧洲史》,以黑格尔哲学的方法,探索一个世纪的精神基础,归纳出“自由的宗教”、“对立的信仰”和“浪漫主义”3个要素,借以把握时代意识。书被摧成,克罗齐题献给他的德国挚友、著名作家托马斯·曼,引用但丁《神曲》第二十三首歌为卷首题词:“此时你的思想进入我的思想,带有同样的行动和同样的面貌,使得我把二者构成同一个决定。”托马斯·曼将瓦格纳视为19世纪的象征。理查德·瓦格纳的精神形象多难而伟大,正如他完美地体现着的世纪——19世纪。瓦格纳和19世纪,便是托马斯·曼和克罗齐指摘、赞美和反复道说的一切:

我看见他脸上刻着这个世纪的全部特征,表露着这个世纪的全部欲求,我简直无法将对他的作品,将对这个时代的产儿,对艺术创作世界卓尔不群而又备遭非议、最费解而又最具魅力的伟大人物群众的一员的爱与对这个世纪的爱区分开来,他的一生,那颠沛流离、饱经风霜、神魂迷狂、令人难以看清其面目而最终沐浴在世界荣誉光辉中的一生占去了十九世纪的绝大部分。……我们不仅鄙夷十九世纪的信仰,一种对信念的信仰,而且也看不惯它的无信仰,即它那种伤感的相对主义。在我们看来,它对理性与进步保持着宽厚、忠诚是可笑的,它的唯物主义太叫人捉摸不透,它的一元论的破解世界之谜的妄念却又极其浅薄。(曼,2013:5~6)

质言之,19世纪徘徊在神话与虚无之间,于是有了伤感的相对主义。“伤感的相对主义”,

正是德国浪漫主义所表达的精神悖论,以及这种精神悖论所驱动的“悲剧的绝对性”。一方面,家园失落,漂泊若萍,相对取代绝对而成为神话;另一方面,个性张狂,魔性涌动,神话化作绝对的虚无。瓦格纳从历史歌剧走向神话,从而发现了自我,以及作为“总体艺术作品”的国家。其音乐一般的心灵品格具有某种悲观主义色彩的凝重而缓慢的向往,节奏中充满了断奏与裂变,以及为走出阴暗和紊乱、在美中得到解脱而展开的悲剧性抗争。他的作品诅咒白昼,膜拜黑夜,在精神上直接就是浪漫主义的传承。浪漫主义发现,夜是一切浪漫情怀的故乡和国度。夜晚真实,而白昼虚伪,夜晚多情善感,而白昼冷酷无情。夜晚主导生命,安慰生命,救赎生命,便是浪漫精神的原型,且同一切母系的月亮崇拜联系在一起。对女性、对月亮、对黑暗的崇拜,从来就对立於对男权、对太阳、对光明的崇拜。自觉迎着黑暗走去而英勇地遭遇黑暗,从黑暗之中获取隐秘的知识,从而完成自我救赎,此乃灵知主义。从早期浪漫主义到瓦格纳,德国诗文、戏剧、音乐、绘画甚至史乘都处在这个灵知主义的魔力之网中。灵知主义魔力之网中,黑暗与光明、邪灵与圣灵、此岸与彼岸、内在与超越等对立范畴相辅相成,塑造了浪漫主义以至19世纪之特殊悖论品格。

在《十九世纪欧洲史》中,克罗齐就揭露了浪漫主义的悖论品格。他把浪漫主义分为两种类型:理论—思辨的和实践—情感—道德的。理论—思辨的浪漫主义是对启蒙时代占主导地位的“文学学院主义”和“哲学唯理论”的论战和批判,所以闪烁着真理的光芒,让历史焕然一新。而实践—情感—道德的浪漫主义则是“疾病”、“世纪病”,源自狂飙突进运动而在19世纪动荡衰落的时代臻于高潮。伦理的浪漫主义,首先是猛烈冲击现存社会的法律、习俗和思想,其次在否定和疯狂破坏的冲动中表现出迷失、软弱,提供灾异、失序的证据。克罗齐写道:

伦理浪漫主义,作为疾病的浪漫主义,作为“世纪病”,既不拥有过去的传统信仰,也不拥有现在的理性信仰,伴随着相应的实践与道德表现,恰恰证明缺乏信仰,受到渴望塑造一种信仰

的折磨,伴随它无力完成这点,无法满足一次次断言的东西,或无法确立它们作为思维和生活的准则;因为信仰自发地必然地从我们良心深处述说的真理中诞生,从来不会通过愿望和想象的焦急组合去探寻而获救。(克罗齐,2013:35~36)

浪漫主义敏感、伤感、自相矛盾、反复无常、漫无头绪,克罗齐用了“妇人心灵”这么一个不甚得体的词语来摹状它。“在自身激起怀疑与困惑,其后又难以驾驭,钟爱并追求危险,并在危险中自消自灭”,或许就是托马斯·曼所说的“感伤的相对主义”。浪漫派的梦想,即重返宗教超验和平境界,在寂静与断念之中停止思想的怀疑与忧患,实质上就是把决断的权力完全交付给随机的偶然性,将生命完全托付给飘忽无定的机缘。同时,浪漫派人士在爱情中探寻解放,在所爱的女人身上探寻神圣,最终乃是“依恋”强化为“贪恋”,“爱欲”下流为“情欲”,奔向性欲亢奋的狂喜,在永不满足的渴望之中求取片刻的欢愉。“这是截然不同的美——不是在其中生活的欢乐微笑,因为,相反这种美得以表现的意象是痛苦和渴求的纵欲,是腐败与死亡,富有魔鬼崇拜和性虐待狂的色彩”。(克罗齐,2013:210)总之,伦理浪漫主义可谓莫焉下流,其审美形式背离了早期浪漫主义浮士德式的冲动,远离了关于崇高爱情心心相印的梦想,背叛了早期浪漫派艺术化与诗化的伟大承诺,也忘却了中世纪宗教骑士简朴单纯高雅飘逸的生活方式。

1965年,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在华盛顿美术馆发表系列讲演,题为《浪漫主义的根源》。他的立意是约瑟夫·巴特勒的名言“万物有本然,终不为他者”,即自律自在、自己作为自己之理由的存在状态。他的讲演贯穿着3个基调:第一,浪漫主义与艺术休戚相关,自是艺术的基本精神;第二,浪漫主义是近代一场改塑了人类生存状态和思想范式的巨大变革;第三,近代以来流布深广而影响至深的各种潮流,都是浪漫主义的继承者,包括民族主义、存在主义、英雄主义、奇理斯玛主义、非人体制、民主主义、极权主义。

18世纪优雅、平静,人们循规蹈矩,信奉理性至上,然而一股仿佛来自史前深渊的力量,

非人而诡异的力量驱动着人类的血气与激情,让人对阴森神秘的哥特艺术兴味盎然,喜好沉思冥想,神情忧郁而神经兮兮,崇尚天才,膜拜眩惑之妖,追随旋风之神,而放弃对称优雅,鄙视清楚而明白的理念。然后是地火运行,天怨人怒,神像被毁,国王上了断头台,恐怖降临人世,世间罪恶满盈。伯林断定,这一场近代剧变乃是文明的主导模式之变,是一种独特生存样法的显山露水,是绝对知识和至高法则的废黜。而这场剧变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的希腊,仿佛过分专制的理性主义使得人类的情感受到压制,人类情感以反抗的形式自我表现。“当奥林匹亚诸神变得过于驯服、过于理性、过于正常时,人们很自然地就会倾向于那些较为黑暗的冥府之神。”(伯林,2008:51)启蒙时代激进阵容里的孟德斯鸠的文化相对论直接消解了客观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不变实体,休谟因果律的解构有力地震撼了理性基础,然而德国默默无闻的哈曼用一个神话的上帝或者一个诗化的上帝将潜于优雅世纪底层的神秘暗流搅成巨流。于是,“神话使用艺术意象和艺术象征而非词语来传达生命和世界的神秘”(伯林,2008:54)。伯林认为,德国的赫尔德和康德比卢梭更有资格成为浪漫主义的鼻祖。尤其是赫尔德,其行动优先、象征至上、语言独具创造力的观念颠覆了影响西方2000年之久的“永恒哲学”,从而把一个世纪带向了信念与实践的暴力冲突之中,带向了民族革命之中,带向了艺术的创造性爆发之中。

伯林用心体察18世纪到19世纪思潮涌动的节奏,将浪漫主义分为“拘谨的浪漫主义”(Restrained Romanticism)和“奔放的浪漫主义”(Unbridled Romanticism)。“拘谨的浪漫主义”以康德和席勒为代表,他们为人类自由的理念陶醉,向往那种超越理性规范的游戏境界。但他们小心谨慎地提出了反权威原则,肯定意志的至高无上。“奔放的浪漫主义”则由费希特的知识学、法国大革命以及歌德的《威廉·麦斯特》所代表的三大潮流为表征。首先,费希特之“自我”与“非我”及其悖论驱动下的行动,肯定了生命的创造性冲动,而将“原初的人”推向了世界历史舞台的中心。费希特的“意志至上”与谢林的“神秘主义活力论”融合在一起,伟大

的象征主义概念便脱颖而出。“浪漫主义是蛮荒的森林，是一座迷宫，唯一的向导是诗人的意志与情绪（激情）。”（伯林，2008：102）在这种意志与激情的驱使下，他们要沉入到世界的深处，进入幽暗的内在，再现不可再现的神秘之物，也就是以有限象征无限，以有形象征无形，以死亡象征生命，以黑暗象征光明，用空间象征时间，用言语象征那些不可言喻的东西。无限、无形、生命、光明、时间，一切不可言语的东西，就是令他们万分憔悴的慕悦对象，是他们大写乡愁的终极寄系，这份慕悦之情，这份大写乡愁，构成了一种形而上的天真，一种偏执狂，一种永远不可慰藉的心灵创伤。其次，法国革命将一种浪漫主义变成了历史，将一种诡异的非人力量变成了现实，而其始料不及的恐怖后果预示着一个更加凶险、更加邪恶、更加神秘的20世纪。第三，歌德的《麦斯特》几乎就是自由意志的颂歌。歌德以“成长的传奇”暗示一种奔放的浪漫主义精神。天才如何炼成？又如何担当天才的使命？歌德的象征主义暗示：唯有通过行使高贵而落拓不羁的自由意志。这种精神亦是浮士德无限奋斗而驰情入幻的精神，亦是施莱格尔《卢琴德》之中爱欲驱动而佳媛为师不断提升生命净化欲望的精神。总之，奔放的浪漫主义肯定了自由无羁的意志，否定了世上存在事物的本性，无情地摧毁了事物具有稳定结构的观念。而这就是浪漫主义精神的彻底革命性之所在。

伯林对浪漫主义的神话与象征推崇备至。在他看来，科学的认识杀死了现实，而拯救现实的唯一方法乃是借助于神话与象征。神话之中包含着不可言喻的东西，并且尽其所能将那些隐秘的、非理性的、难以再现的东西浓缩为意象，由意象引领心灵通达遥远，通达无限。“神话总是心灵在相对宁静中对之沉思的意象，同时也是某种代代相传，随人类的转变而自我转变的永恒之物。”（伯林，2008：122）因此，莫扎特、瓦格纳的歌剧，博克、迈斯特的政治哲学，德国历史法学，李斯特的经济学，极权主义政制与话语，存在主义哲学，都是浪漫主义的神话与象征体系的变体。他们都认识到，伟大的意象主宰着人们，认识到黑暗力量、无意识、不可言传之物、神秘之物的重要性，以及忽视它们必然产生

的灾难性后果。他们都从各个侧面昭示了浪漫主义的最基本要点：“承认意志以及这样的事实：世上本不存在事物的结构，人们可以随意地改造事物，事物的存在仅仅是人的创造活动的结果。”（伯林，2008：123）而这种浪漫主义就是一种政治决断论了，它宣告每一个体都可以行使高贵无羁的自由意志，伸张自我，决定命运，选择未来。

参考文献：

- [1] Arthur, Lovejoy. On the Discrimination of Romanticisms [A]. In *Publications of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PMLA)*, Vol. XXXIX [C]. 1924. 中译参见洛夫乔伊. 观念史论文集 [M]. 吴相译.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5.
- [2] Arthur, Lovejoy. The Meaning of Romanticism for the Historian of Ideas [J].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III, 1941, (3).
- [3] Babbitt, Irving. *Rousseau and Romanticism* [M]. New York: Meridian Books, 1955. 中译参见白璧德. 卢梭与浪漫主义 [M]. 孙宜学译.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3.
- [4] Philippe, Lacou-Labarthe & Jean-Luc, Nancy. *The Literary Absolute: The Theory of Literature in German Romanticism* [M]. Trans by P. Barnard and C. Lester.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8.
- [5] Rene, Wellek. The Concept of Romanticism in Literary History (1. The Term “Romantic” and Its Derivatives) [J]. *Comparative Literature*, Vol. I, No. 1, 1949 (winter).
- [6] 埃柯. 符号学与语言哲学 [M]. 王天清译.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6.
- [7] 伯林. 浪漫主义的根源 [M]. 吕梁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8.
- [8] 布鲁姆. 神圣真理的毁灭:《圣经》以来的诗歌与信仰 [M]. 刘佳林译. 上海: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 [9] 卢卡奇. 小说理论 [M]. 燕宏远, 李怀涛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2.
- [10] 克罗齐. 十九世纪欧洲史 [M]. 田时纲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3.
- [11] 托马斯·曼. 多难而伟大的十九世纪 [M]. 朱雁冰译.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3.